

临汝战斗生活回忆(下)

●王武烈



不久,以王云清为首的地方领导干部来到了临汝,这批干部有20多人,都是骨干。根据地委指示,我和王云清同志研究,组成了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县工委由王云清、我和占荣3人组成,王云清同志任书记,我和赵占荣为委员。我记得主要干部还有马象堂、傅长富等。当时,我们建立了3个区,一区在观上,二区在牛扎,三区在杨楼。王云清同志还传达了五地委的指示,批判了过去的急性土改和“抄家点火”分浮财的错误(实际上早已纠正),确定了我们今后工作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清匪反霸,实行二五减租,取缔保甲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并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自己的武装。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们在汝河南的工作又有很大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片地区已经解放。临汝县县政府办公地点,从和尚庙搬到观上再搬到滕店,经过了半年多的游击战斗生活,直到1948年4月,才正式搬入了临汝县城。

二、剿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全力支持前线

我们一进城,就向全县人民宣传党的政策。告诉大家:我们是人民政权,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我们要对地主恶霸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目的是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要解放全中国。这些宣传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很快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欢迎。

进城后,我们又先后建立了城关、临汝镇、庙下、夏店、纸坊等区。加上原来汝河南3个区,全县共有8个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干部不够用。连我从黄河北带来的民兵都用不上不够。经县委研究,决定举办培训班,招收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办培训班先学习并安排临时工作,经过一段实践,认为可以,再吸收正式参加工作。我们还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有五六百多人参加。我向大家讲了全国的形势,讲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依靠、团结、改造的方针。经过这次大会,调动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会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回乡村任教员,一部分吸收到县、区机关工作,大大缓解了干部不足的困难。这时,组织上又从黄河北调了一批干部来临汝,如副县长吕芳滨、县委副书记马云生以及张光汉、马品三、刘德泰、刘振邦、张英仁等都是这时来的。这次总共来了10多名领导干部,但有经验的干部还是不足。

县府未搬进城前,就开始了支援前线工作,主要是支援主力部队攻打洛阳。临汝县是攻打洛阳的后方,我们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全力支援前线战斗,从粮食柴草、担架、民工、小车、马车等等。不久洛阳就解放了。我们县公安局和民兵把从临汝跑出去的土匪头子也乘胜抓回来一些。

全县虽然解放了,但小股土匪武装还在危害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根除匪患,军区党委决定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到各县去剿匪。我们临汝县政府根据军区决定,成立了临汝县独立团。我是挂名团长,范金标同志是团长,张良诚是政委,李杰为参谋长。为了便于发动群众,独立团以排为单位开展活动,地方干部和主力部队密切配合。我们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为了相互配合,发挥力量,还在分区的领导下组织了联防区。以临汝、伊阳(今汝阳)、禹县、郟县为一个联防区。经过半年多的清剿,大批股匪被消灭,如有名的股匪刘殿宽、姚保安、王斗等。人民政权已经建立,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县独立团的任务已经完成。淮海战役开始后,根据上级指示,县独立团大部分随范范金标团长参加了淮海战役。留下一个营,由刘纯甫为营长、徐建民为政委。后来刘、徐又调走,临汝就只剩下赵占荣同志为首的县大队了。

为了彻底消灭土匪,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后,还组织远征捕匪小分队,到西安、武汉、新疆等地抓回了王景元、郭允恭等土匪头子。在我离开临汝时,剿匪工作上算是结束了。

中原军区驻在宝丰,临汝是到洛阳的必经之路。我们支前队的任务十分繁重。来往的首长都要经过临汝。那时工作繁忙忙不能坐下来开个会,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动群众。有一次张际春副政委路过临汝,我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出当前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地方干部少,二是事务性工作太多。张政委说,干部问题我回去给你们反映。来往人多,你们可以把县政府的牌子不挂在大街上,人家找不到,可能事务性接待工作就少一些。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把县政府的牌子挂到后门去了,因为后门在背街上。可是,不久陈毅司令员来到临汝,他到处找不到县政府。结果,在一个背街后门才找到我们。我当时在房里听见小吉普车的声音,知道是来了首长,这时警卫员说是陈毅首长找我,我赶紧去找陈毅同志。他批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牌子挂到大街上?你们把它丢到厕所去吧!堂堂的县政

府,像什么话,成什么样子。”我一看陈毅同志发脾气了,忙请他到县政府坐下。我作了自我批评并解释说人山人海,影响工作,办公都办不成。他说:“你们这个小县城都管不了,以后要是解放了上海、南京怎么办?”我忙说:“我马上把牌子挂回大街正门上。”当时来往经过临汝的部队很多,有些战士乱打枪,陈毅同志正好听见枪声,就问,这是什么人打枪?我说:“这里来往部队很多,不知什么人乱打枪。”他问是哪个部队在这里驻防。我说这里有一个独立团。他叫我派人去把范金标、张良诚同志都请来。他们来了后,陈毅同志问:“是谁在乱打枪?”范说:“来往部队很多,不了解。”陈说:“你们住在这里,就应该归你们管,不管什么军队,无论什么人,都要管起来,不能乱打枪,要维持好秩序。现在我们在小城市都管不好,将来到了大城市怎么办?”我和范、张把我们剿匪的情况作了汇报,他听后很满意地说:“你们工作有成绩,要抓紧消灭土匪,不然群众就不能安居乐业。”这次陈毅同志在临汝停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随后就到宝丰去了。

亲耳聆听陈毅同志教诲的事还有一次。当时驻在临汝的中原军政大学(现文化局院内——编者注)张衍教育长,有一天通知我和王云清、范金标、张良诚等同志去听陈毅司令员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我们一到会场,陈毅同志说,你们都来了。张衍教育长马上给我们作介绍,然后就坐下来听陈总作报告。陈毅同志作报告没有讲稿,甚至连个提纲都没有。他讲了整整一个下午,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得非常生动,有说服力。特别是当他讲到有些新来中原军政大学的学生,有怕当兵的思想时,情绪很激动。他站起来说:“我们军政大学的学生就是要当兵,不是来做官的,不愿意的就请你回去。你不想当兵,你想当还不够格哩,你撒泡尿照一照,你够不够格?老实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才能分配工作,要先下连队当一个合格的兵。不要怕苦,不要怕累,不要怕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当这个兵,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他讲了三四个小时,下面2000多学员鸦雀无声。这次报告不但对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而且对我们这些参加工作10多年的人,也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我们回来都说:“陈老总真有魄力,是元帅风度。”听陈毅同志报告的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是,陈毅同志那天的音容笑貌、不凡的气度、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语言至今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之事,令我终生难忘。

三、充分发动群众,健全人民政权,发展党的组织

由于过江推迟,中原局党委把准备过江的干部留在豫西发动群众,作后方根据地的巩固工作。因此,1948年9月,从山东调到中原的8000余名干部中抽调150多名干部,充实到临汝干部队伍,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力量,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根据地委指示,县委领导班作了大的调整,夏如爱同志任县委书记,王陵、王云清、马云生为副书记,我和吕芳滨任正副县长。李砚农任农会主席,尹子明任公安局长。这时,全县共成立了12个区。县委委撤消,正式成立了中共临汝县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等都建立健全了。县委和政府正式分开办公。县政府下设秘书科(刘众为科长,后为副县长)、支前科、教育科、司法科、民政科、工商科等,县政府机构基本配置齐备。

我们在临汝第一阶段的工作(近一年时间),主要是剿匪、初步建立政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支援前线和保障供给。真正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群众,是从山东干部来了以后才开始的工作。我记得山东干部来了以后,县委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由我和王云清同志向新到的干部介绍了情况,王陵同志宣布了干部分配名单,夏如爱同志做了工作部署,然后我们就分散到各个区开始发动群众。

我们这次发动群众,首先是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由点到面进行推广。干部一进村,首先向群众讲明来意,是要和大家一起清匪反霸,打倒恶霸地主,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其工作方法是:个别串联,访问问苦,扎根串连,启发群众,提高觉悟。通过诉地主的恶苦,在发动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经过教育培养,由他们再去串联别的骨干或积极分子。诉苦采取的是由个别诉苦,到集体诉苦,然后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加入农会也是先由个别介绍发展对象,然后再吸收入会。建立起农民协会后,由农会的会员研究斗争对象,然后面对面地向地主恶霸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不断提高农民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力量。为了建立乡村政权,我们先建立农会,一切权力归农会,为后来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了乡村人民武装,即民兵和自卫队,个别有条件的村还建立了党的小组,对乡村的原有政权也进行了整顿。这个过程一般要进行两个多月,这样不仅建立了党在农村的领导优势,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一个村的试点工作基本结束后,通过总结经验,就向面上展开推广。为了加快发动群众,推动工作,我们还采取“滚雪球”的办法,先在试点村训练培养一批骨干,然后,把这些试点上的积极分子,一起带到下一个村庄开展工作。全县按这样的方法,共分三批进行,每批搞三分之一,经过三四批的发展工作,全县各村庄的农民

协会都逐步建立起来了。全县农村500多村庄,吸收农会会员50000多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选举李砚农同志为主席,霍华章、史长林、关金斗为副主席。会议结束时还举行20000多人的大游行活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在抓好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还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选择优秀的骨干作为培养对象,积极开展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当时,发展党员还是秘密的,要进行个别教育。特别是保密教育,然后经过审查、批准,再进行宣誓后才正式加入共产党。如果一个村够3个党员以上,就建立党支部。

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我们还发动妇女,组织妇女,开展妇女工作;此外还发展了青年团员,建立了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根据许昌地委的布置,全县又在清匪反霸的基础上,开展了“天蒋翻身”的参军运动。我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为了彻底翻身得解放,就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在发动群众控诉地主恶霸罪恶的基础上,让群众懂得地主恶霸的总后台是蒋介石,要彻底翻身就必须打倒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成了当时最具有号召力的行动口号。要打到南京去,要打倒蒋介石,就必须要有人民的军队,就必须要有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我们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这些思想,用以武装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人民的军队,用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和广泛动员,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纷纷带头,在县农代会上青壮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加参军。全县农代会结束后,各区也开了代表会。代表们在各村广泛宣传,造成了参军光荣的动人局面。全县有上万人报名参加参军,经过挑选,约27000名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临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参军运动。这批军人对解放战争和以后的抗美援朝,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参军运动结束不久,大约在1949年3月,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原来留在临汝的干部,要支援新解放区开辟工作,准备过江。按上级指示,夏如爱、王陵、李砚农、尹子明、白希清等领导干部100余人,过江去湖南开辟新区。临汝县委进行了大的改组,我改任县委书记,宋寅、霍华章为副书记,孙志恒为代理县长。虽然山东来的这批干部在临汝工作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对临汝的贡献是很大的。临汝县的工作基础已经打牢了,局面也已经打开了。

四、“一、五”区土匪暴乱和复查运动

正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临汝县一区和五区于1949年3月中旬发生了土匪暴乱的反革命事件。这次土匪暴乱,主要是原来没有彻底肃清的土匪,趁我们独立团刚调走,参军运动结束,新兵刚送走,一部分老干部南下刚离开临汝时,他们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几个土匪头子串通混入我们队伍内部的个别乡干部,妄图推翻我们的乡村政权,为地主恶霸反攻倒算。他们杀死了我们乡村的一些干部,夺去了我们民兵的武装。一时之间这个地区变了天。我和县委领导对此事件作了研究,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经过认真分析,敌人不过一二百人,最多不过三五十条枪(土匪还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暴动——编者注),他们是乌合之众。而我们虽然新兵多,但有赵占荣同志的县大队两个连,县公安队战斗力又比较强,再加上3个区中队配合,约有四五百人的力量,足够对付他们。关键是不能犹豫,要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把他们消灭掉。我们决定在白天不亮的时候,把敌人包围了。只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就把他们消灭了(彻底平息土匪暴乱用两天时间——编者注)。经过3天清理,真正的土匪也不过有七八十人。经过发动群众,把上当受骗的群众取过来,反戈一击,捉住了主要匪首,开了公审大会,就地镇压了。“一、五”区土匪暴乱就这样平息了。

但是,这次“一、五”区土匪暴乱事件,不仅是对临汝县工作的一次考验,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第一,土匪必须彻底肃清,不能有任何麻痹;第二,革命队伍内部不纯是最大隐患;第三,我们在参军运动中个别干部搞强迫命令,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大家吸取了这次经验教训,更加认真细致地投入工作,我们对清匪反霸进行了复查,对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了清查,提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纯洁匪首,收尽枪支,整顿队伍,清查内部不纯分子”的工作方针,把混进民兵组织的不纯分子50多人清洗出去了,又把混入干部队伍中的不纯分子100多人,也清理出干部队伍。经过这次清理整顿,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了战斗力,并进一步把清匪反霸和群众运动引向了深入。

五、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

我们在纠正“左”的“走马点火”和急性土改错误后,就曾提出“二、五”减租的口号。但是,当时大部分地区并未真正开展这项工作,只是在清匪反霸的过程中,结合着开展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因为土匪恶霸是群众最痛恨的,匪霸对人民的危害也最大。因此,群众迫切要求清匪反霸。相对来说,对减租减息的要求不十分迫切,这是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

到了1949年10月,根据河南省委和许昌地

委的指示,我们正式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的一次大革命,是翻身贫苦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县委根据临汝县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第一批是试点,只是3个村先开展。第二批扩大到每个区3个村庄。第三批全面展开。

临汝县的土地改革,是在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开展的。前一段虽然发展了不少党员,但是由于在战争年代,对党员的教育并没有认真抓好。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完全入党。思想问题不解决,是不能适应和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

为了领导好土地改革运动,首先就要整顿党组织。我们的党员有很大一部分是新吸收加入组织的,入党时间短,入党后又忙于各种工作,忽视了党员教育,觉悟不高。有的和地主划不清界限;有的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还有个别的组织不纯。另外,过去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现在根据全国的形势和工作需要,为了使党的各级组织能够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土改开始后,首先需要公开党组织。具体做法是由县、区、乡逐步公开,以便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公开党组织的过程中,我们配合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育。让大家明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组织,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经过学习、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开展了以查组织、查思想、查作风为内容,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进行自我教育。特别是党员公开后,要进行群众评议。让党员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这对党员教育很大。经过这次整顿,大大提高了党员的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这次清查的结果,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3%的党员不合格。同时,通过整顿还加强了团结,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为土地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贫下中农,保护中农,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始终坚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对包办代替,反对行政命令,反对主观主义。

首先采取让群众起来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让贫下中农认清究竟是谁养活谁。是地主养活我们,还是我们养活地主。经过算细账,让贫下中农弄清不是地主养活我们,而是我们养活地主,是地主剥削我们,不是我们命中该穷。土改就是要让土地还家,使“耕者有其田”,是理所当然。地主阶级剥削我们几千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首先就是要领导我们夺回土地,让土地还家。通过这些教育,启发了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才真正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自觉性。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翻了身。当时,共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10多万亩,房屋3万多间,大牲畜3千多头,粮食18万斤。全县经过5个月的斗争(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结束。

六、结束土改 转入抓生产

1950年3月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地委指示,除了个别地方还要进行土改补课之外,主要精力转向抓生产。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了解放生产力。过去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土地还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当时要发展生产,还要克服很多困难。主要是缺种子、缺资金、缺牲畜、缺农具、缺肥料等生产资料。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县委、县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战胜困难。一方面普遍号召,另一方面又深入群众,帮助他们组织互助组,树立典型。当时互助组多数是三五个人一组。有临时的,也有固定的。党员带头,发动互助,组织起来力量大。在组织起来的农民面前,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通过互助组这一新的形式,终于领导农民战胜了困难,获得了领导生产的成功。为了帮助农民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扶助农民搞好生产,我们政府还想办法发放了贷款。经过各方努力,在1950年秋天获得了一个好收成,粮食产量增加一成多。县里为了鼓励搞好生产,还召开了劳模大会,为全县人民树立了搞好生产的典型。当时受到表扬的劳动模范不少,其中对特等劳模许牛娃,奖励一头大黄牛,其余奖给大小农具。这次劳模大会的召开,为全县人民树立了劳动致富、劳动光荣的楷模。

1951年3月,许昌地委通知,调我到许昌县委书记。于是我就结束了在临汝4年的战斗生活,离开临汝,赶赴新的工作岗位。

(作者王武烈,山西省左权县石拐头村人。1923年1月生,1939年10月参加工作,1941年1月入党。先后任温陟县二区区委书记,温县五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1947年8月随军南下,同年11月来到临汝。1951年3月调离临汝,先后任许昌县委书记、许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南行政区财政委员会人事处长,中南行政区粮食局副局长,东北铜铅锌矿务局副局长,云南省东川矿务局副局长、局长,东川市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云南省冶金厅副厅长、厅长,党组副书记、书记,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4年6月离职休息,现已病故。)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

风味小吃

烤玉米、烧红薯



汝州盛产玉米、红薯,烤玉米、烧红薯是两种十分受欢迎的美味食品。

在农村,每到深秋,玉米、红薯相继成熟收到家里,闲暇时人们便挑选鲜嫩的玉米,除去苞皮,用火灶串起来,放到火炉上,不停地翻腾着烤,直到烧得黄焦喷香,非常好吃;或将红薯放在烧火后未燃尽的燃灰里,用带火星的灰灰捂住红薯闷烤,或把红薯放在煤火炉口周围烘烤,一会儿就能把它烤软烤熟,把皮剥掉,就可以食用了,吃着香甜可口,是一道名副其实的美味。



在城里,街头叫卖的烧红薯也是一道风景。叫卖者或定点边烤边卖,或推着自制的烤箱(多为在大铁皮筒内糊泥制成)边走边烤边卖。此行还有一个特点,卖者不时打开嗓子吆喝一声:“热啊——红薯!”

汝州童谣:
红薯玉米收到家,烧熟吃着笑哈哈。
城里想吃掏钱买,香味飘到千万家。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裕园路南行,至中大街十字街,有固定的烧红薯门市;2.流动摊位出售。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打铁梨花

打“铁梨花”或称打“铁花”,是流传于京豫晋地区民间传统的设火,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采矿炼铁史同步兴起。拥有丰富煤炭和铁矿资源的汝州也成为中原打“铁梨花”的重要传习地区,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汝州打“铁梨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一千年绝技就起源于崆峒山道教文化,是一种由民间工匠及崆峒道人共同祭祀道教始祖广成子而举行的活动,后来演变为综合性民间传统庆祝仪式,在春节期间为民众表演。汝州打“铁梨花”是我省现存比较完整的大型民间传统焰火,素有“中原焰火之最”“华夏第一铁花”的美誉,于2016年被汝州市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铁梨花”就是将铁熔化成铁水,然后洒向空中,形成美丽的“焰火”景观。打“铁梨花”的主要用具有:铁炉、风箱、砂锅、火钩、舀勺、木拍等,用料有:木炭、生铁。先用草谷壳(麦壳、谷壳)与黏土加水搅拌均匀,在一柱形铁桶内铺设砂锅,用草泥衬底,砖头围砌成铁炉,把生铁砸碎加入砂锅,点火加入焦炭,拉动风箱助燃,将砂锅放在炭火上,加盖保温,经30分钟左右,铁水融化,一人用舀勺舀起少许铁水抛向空中,另一人用木拍猛力击打,铁水飞散,在空中绽放出美丽的“烟火”。

近年来汝州民俗文化、民间技艺迅速繁荣,汝州城隍庙打“铁梨花队”继承了传统打铁梨花的技艺,并不断创新,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摸索出多炉(10炉)布局,2-6点同时开打,此起彼伏,美轮美奂的效果。

2016年打“铁梨花”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郭长兴、潘法庭等。